

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 How to Explain the World Without Becoming a Bore

宗教社会学丛书

高师宁 黄剑波 / 主编

碰巧成为社会学家的冒险之旅

如何生动地诠释世界

[美] 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 著

张亚伦 / 译

·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宗教社会学丛书

高师宁 黄剑波 / 主编

碰巧成为社会学家的冒险之旅

如何生动地诠释世界

[美] 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 著

张亚伦 / 译

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

How to Explain the World Without Becoming a Bo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7 - 19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碰巧成为社会学家的冒险之旅:如何生动地诠释世界 / (美) 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著; 张亚伦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宗教社会学丛书/高师宁 黄剑波主编)

书名原文: 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 How to Explain the
World Without Becoming a Bore
ISBN 978 - 7 - 5203 - 0907 - 3

I. ①碰… II. ①彼…②张… III. ①宗教社会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28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特约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7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6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2009年夏天，我应邀到位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中欧大学讲一次公开课。我问他们希望我讲什么内容，他们说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讨厌这样，我不是一名传教士，也没准备要在布达佩斯进行一场布道。之后他们提到了一个有用的模式，他们称之为“自我介绍”。他们指的是自传吗？不，他们指的是关于演讲者自身学术生涯的报告，包括他所研究的议题，所接触的人以及在探索旅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我认为这个方法很有趣。不仅我讲课时可以乐在其中，而且观众也会对此很感兴趣。回到家后，我就开始写一本书，就是你现在所读的这本。

同年夏天，就在我去布达佩斯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的女儿在维也纳有过一次对话。她刚刚开始在大学里学习社会学，但对此却很失望。她读过我之前写的《与社会学同游》（*Invitation to Sociology*）这本书，期望有一次令人兴奋的知识旅程。相反，她感觉很枯燥。我不知道最近在维也纳大学所教授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学（每当回到家乡，我并不是审察奥地利的社会学，我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如果维也纳的课程和欧洲或者美国教授的大多数课程差不多的话，那眼前这位年轻聪明的女士觉得课程枯燥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社会学的笑话很少。在这极少的笑话中，下面这个和我们的话题有直接关系。有一个病人从医生那里得知他十有八九只能再活一年。听到这个噩耗，病人问医生有什么建议。

“和一位社会学家结婚，然后搬到北达科他州。”

“这能治好我吗？”

“不能，但这一年会感觉很长。”

最近几十年，社会学得了两种病：一是盲目地崇拜方法论，只关注表象把他们带到了数不清的方法当中；二是宣传意识，不断地重复同样陈旧的准则（有时夹杂着丰富的词汇）。这两种疾病使人们更加厌倦社会学。数不清的方法本身并没有错，它们可以很有用。但为了那些愿意资助昂贵调查报告预算的人们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人们用越来越复杂的方法去探究越来越不重要的题目。对于意识准则来说，30年前他们可能曾经让人激动过，但今天他们更易于制造无趣。当然也有例外。有些社会学家作出了有趣且重要的研究。说这样的社会学家只有一小部分是公平的。

我告诉这位年轻的维也纳女士，社会学不一定枯燥。如果她继续坚持留在这个领域，那将会由她来决定做一些不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当一个学者拥有了一个终身职位后，她可以做许多她喜欢做的事情。甚至在大学里也有许多由政府官僚管理的合适的职位，所发的薪水也和那个职位相称，（可能更重要的是）每年都有长暑假。学术界之外也有很多适合社会学家的职位。社会学，不像大多数别的社会科学（除了人类学），它允许它的实践者去研究一系列更为广泛的课题。正如我所发现的那样，它非常适合那些拥有持久不变的魅力并对人类世界抱有广阔全景的人，也适合那些愿意一探究竟的人（如果有必要，他们会通过锁眼来看别人的邮件）。

我上研究生时，就犯了后面那种错误。那时我的女朋友和另外一位学法律的女士合租了一套公寓。这个人相当粗心，公寓里到处都躺着她的物品。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卫生间发现了一封她写给男朋友的信。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信。一共有四页，一倍行距的打印稿。整封信的内容几乎是他们上个周末的心理剖析。每件事基本上都采用弗洛伊德的措辞方法：他说了什么，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周末的事情和他潜在的神经衰弱症有什么关系，他妈妈是怎么介入的，这些事情是如何影响到写信者的，等等。我偷走了那封信。我认为它是一个无价的文化档案，需要为后世保存起来（我不得不说的是，后来信丢了）。

最后致谢：感谢我的经纪人劳拉·格罗斯。她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我很大支持，她的聪明和热心无人能及！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巴尔扎克在第十二大街上	(1)
第二章 难以置信的视野	(36)
第三章 从一个小集团到一个没落的帝国	(71)
第四章 在地球上艰苦跋涉的社会学	(103)
第五章 许多神和无数的中国人	(129)
第六章 政治上不正确的偏离	(149)
第七章 从慕布瓦到古特斯劳	(172)
第八章 指挥家而不是独奏者	(202)
第九章 担任第一小提琴手	(232)
注释	(256)
彼得·伯格的主要作品	(259)

第一章 巴尔扎克在第十二大街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一个错误。我和父母一起来到美国，他们在纽约定居了。那时我仅仅 18 岁。受宗教热情的激励，我想成为一名路德教的牧师，不过，我很快就迷恋在特有的美国移民经历中。约翰·墨里·卡迪希（John Murray Cuddihy）称之为“文明的考验”（the ordeal of civility）^①。也许我早已怀疑这个职业的意图，不管怎样，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将要在此工作的美国社会，我决定首先要把接受神学教育这件事往后放一放。我对社会学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过，调查一个社会的情况看上去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训练。

我没有钱，我父母也没有。我不得不全天工作，一边养活自己，一边攒学费。据我所知，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的社会调查专业是这个城市唯一一个可以在晚上完成所有毕业课程的学院。当然，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新学院大学在美国社会科学界根本排不上名。

有一个让人十分纠结的犹太笑话：一个人来到纽约的一家犹太餐厅。令他吃惊的是，招待他的是一个中国服务员，但他却讲着一口流利的带有立陶宛口音的犹太语。临走时，他对饭店老板说：

“你这儿有一个中国服务员？”

“是的，一年前从上海来的。”

“但他能讲一口纯正的犹太语。”

“嘘！”老板说，“他还以为他在学英语呢”。

我也以为我正在学习美国社会学！

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只够交一门课的钱，这是我上的第一门社会学专业课。老师是阿尔伯特·所罗门（Albert Salomon），课目是“巴尔扎克是社会学家”。这个想法很绝妙，所罗门是一个聪明的讲师。这也是一种听上去非常合理的教育学观念：巴尔扎克本打算将他的小说集《人间喜剧》（*The Human Comedy*）写成一本全面描述19世纪法国社会的小说，从贵族阶级直至罪恶的下层社会。这部小说集确实详细描述了法国社会许多阶层的具体场景。所罗门在他的课程里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巴尔扎克的作品来为学生们介绍社会学里的主要分类：阶级，权利，宗教，社会调控，社会流动，社会边缘化和犯罪。这一个学期我至少要读十几本巴尔扎克的小说。

作为一个独裁的教授，所罗门直接布置了作业，他一点也不为此感觉内疚。我的作业是写一个学期报告。内容是：把巴尔扎克中篇小说中的推销员菲利克斯·戈迪萨尔（Felix Gaudissart）和亚瑟·米勒刚上映的作品《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做一个对比。我的学期报告（我肯定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绝对不是针对社会评论的大作，但我在完成的过程中却很开心。巴尔扎克的戈迪萨尔是一个相信早期资本家必胜的人，而米勒的威利·罗门（所罗门认为）代表着资本主义在某个阶段的衰退。

学期结束时我对19世纪的法国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而我对20世纪美国社会的了解就像没有和巴尔扎克奇遇之前对法国社会的了解那样是少之又少。但通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拥有了一种社

会学视角，为此我很兴奋，所罗门对此是赞叹不已。

不管对或错吧，所罗门把这种视角都归因于巴尔扎克。这是一种对人类行为各个方面充满无尽好奇的视角，尤其是那些通常被隐藏、也被上流社会给否认了的方面。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敬、要揭露真相、具有破坏性的视角。我不知道巴尔扎克是否真如所罗门描述的那样：为了探寻巴黎的秘密，巴尔扎克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若是晚上就更好了），试图弄明白发生在城市社交集会、政府机关、商店、酒馆和妓院的所有事情。但这样一幅社会学家的形象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尽管多年以来，那幅年轻澎湃的画面已经慢慢减弱，但它却一直存在着！

法国政府在第五大道很显眼的地方保存了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建筑作为文化中心。我想现在应该还在。可能是作为在野蛮的美国传播法国文明使命的一种手段。那时正好有一个巴尔扎克的活动。有一个展览会，还有一些演讲，具体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当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目录册，上面复制了一张巴尔扎克的讽刺漫画。他穿了一件有点像修道士的蒙头斗篷衣。斗篷下有一个超大尺寸的头，眼睛里还带了点挑逗的神情。我把照片剪下，镶了起来，至今还挂在我的书房里。

这让我想到了在我开始研究时获得的另一个见解，就是好的社会学和好的小说拥有某种亲密关系。从小说中我们能了解到社会的许多事情。上学期，我在新学院大学结识了一名教授。他在学校的成人教育部教授法国文学。他听了我所研究的课程后说：“你是属于我们的，你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他只是奉承一下。随后几年里，我也偶尔享用这个略带轻蔑意义的修饰词。

新学院大学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它也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该大

学在1919年由一群知识分子成立。他们认为美国学术界是古板苦闷的，并对此感到失望。他们想创建一所“成年人的大学”，他们做到了。本质上，这是一个成人教育课程，不授予任何学衔。任何人都可以来学习。你可以选择最深奥的学科（比如说：佛教哲学），也可以选择最实用的科目（比如说：陶器制造术）。这个项目当时立马就火了，因此可以自给自足。直至今日依然存在，并且成为纽约一个众所周知的机构。其他项目，包括我毕业的那一项，都加入到了成人教育经营里面，至少最初的资金是由它提供的。

一些杰出的学者也参与到机构的创建中，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后者是美国第一流的社会学家之一，曾经在那儿教过一段时间书。不过从一开始一直到1950年持续任职的校长是埃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他是一位古怪的、反复无常的、且最具企业家精神的教育者。他的经历其实有点像范伯伦，他是挪威人，住在美国中西部偏北地区。他的女儿菲利希亚在学校教经济学，是一个出奇安静的人，能明确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1934年，约翰逊开始关心受到纳粹逼迫的德国学者的命运。在各方资金的支持下，他开始了一项工作。他称之为：流放中的欧洲大学。之后学校重新命名为：新学院大学政治、社会科学、社会形态研究之研究生部。真是晦涩难懂！一般缩写为：研究生部。起初参与的教授都来自德国，有些是犹太人，有些不是。随着纳粹帝国的扩张，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加入到学院当中，分别是：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一些学者是相当出名的，比如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为了寻找一个在政治哲学方面有影响力的学校，他离开后去了芝加哥大学。还有克劳德·列维·斯特劳

斯 (Claude Levi-Strauss)，他在二战后回到了法国。在研究生部被官方认可后不久，便开始在几个有限的领域中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稍后增加了人类学）。这个机构真是相当独特：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生部竟然和一个成人教育项目融合在一起！当时没有本科课程，很久以后才加了进去。

研究生部和成人教育项目两者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新学院大学在后来课程的设置中开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模式：所有课都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进行。具体有三个时间段，每隔两个小时为一档。分别是下午四点，下午六点和晚上八点。正如前面所说，这种情况决定了我能在新学院大学上学，但同样也决定了上课地点的氛围。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课程都是在晚上进行，有点神秘感，也是色情主场的时候。绝对的巴尔扎克风格！再加上新学院大学位于格林威治村，整个地方都弥漫着放荡不羁的文化氛围。不用说，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因素促成了一段令人兴奋的经历。

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在那儿上学时，新学院大学只有一栋建筑物。它位于西十二大街 66 号，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所有的课程，不管是成人教育还是研究生学习；所有的办公室；一个不怎么样的图书馆；一个自助餐厅和一个礼堂；这所有的一切都挤在这栋建筑物里。每个教室都画着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有关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壁画。其中有一副是墨西哥革命画家约瑟·克莱门特·奥罗斯科 (José Clemente Orozco) 的巨作。上面画着带有英雄相貌的列宁和斯大林。(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学院里一场激烈的辩论后，它被一块和图画一样大小的幕布挡住了。如果有人想欣赏的话，可以请求把幕布拉上去。) 所谓的“图书馆”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仅存的几本书也常常不在馆内。

我们的图书馆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顺着第五大道往上走就到了。我大把的时间都投在那华丽的大众阅读室了。后来为了研究我的论文，我在东方藏书阅读室待了很久。自助餐厅很出名，作为一个临时吃饭的地方，毋庸置疑它是镇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当看到卡夫卡和萨特的公开副本时，有多少炽热的目光在相互交流着！

至于那些革命壁画（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弄上去的），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新学院大学曾被传是左翼派。这点有时会让大家把它和杰弗逊社会科学院混淆在一起。后者为美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干部。研究生部迫切想要消除这个盛名，因此在壁画上挂起了幕布。事实上，流亡者学院的中心思想已从社会民主主义变成了比较温和的右倾主义。除了一样带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教条之外，它还有强烈的反共思想。实际上，研究生部的规章里有一项条款，这项条款既清楚又直接地表达了反共态度，即禁止任何一名教授在课程上教导其他组织的思想。20 世纪 60 年代，这项条款被一个好斗的、带有世俗主义思想的教职工使用，他想阻止一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就职于哲学系，结果失败了。

读研究生的人很少，读社会学研究生的人就更少了。大家都彼此认识。大部分人都住在村子里，或者离村子不远。一般都是二房东，住在租来的房子或阁楼里。晚上下课后我们不用走太久就到家了。一般工作的人不能上下午六点之前的课，但大部分人都是工作的。我们通常都会在晚上八点甚至十点的时候出现在新学院大学校园里。当然我们都是清醒的。有时我们会坐在一起辩论。大家很少会在彼此的房间里辩论（那些地方真是不舒服！）。我们更喜欢另外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的名字是亚历克斯罗宋汤店，是一个又脏又暗的小饭馆，过了第六大道就到了。第二个地方是位于第十四大街

的奥维耶多酒吧。后者的男洗手间有一个标语写着“Muerte a Franco!”（去死吧，弗朗哥！）店主自称是西班牙内战时共和军的一个老兵。有一次，他对我说：“不管人们支持哪一种政治观点，但每一个善良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睡觉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

有许多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大部分人只是暂时待一会儿。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很聪明。偶尔我们也会把话题转移到正在阅读卡夫卡读物的年轻女士们身上。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是莱尼·科恩伯格（Lenny Kornberg）。他年纪稍微大一些，是一个退伍老兵。他在新学院大学学习完社会学，又继续攻读了教育学学位。他在西二十大街38号的富人区租了一所房子，和新学院大学在同一个街区。这个房子里住着一些奇怪的群体。房屋管理者是一位瑞士妇人。她常以诗歌的形式通知她的租户。还有一名中国男孩，喜欢在楼梯外破损的壁橱里思索。有时，我自己住那儿。但在知识上对我有重要影响的朋友是托马斯·乐格曼（Thomas Luckmann）。我们在一门哲学课上认识，一拍即合，之后便常常在一起。后来我和乐格曼一起合作写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当然，这种结果在当时是不可预见的。稍后我们会在本书继续讨论这件事。

邂逅了巴尔扎克之后，我便开始实行我最初的计划。我花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去费城的信义神学院读书。我在那儿又学习了一年时间，而且还是快乐的一年。但之后我决定：最终我是不会从事牧师这种职业的。（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和直接的非神学故事无关。简单地说，我不认为我可以完全认同制不可更改的奥斯堡信条的全文。如果把对教理、教义等的认可作为神职授任的条件的话，可能只剩下几个路德宗的神职人员了。回想

起来，这真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决定。) 不管我是把社会学当成了一门学问，还是新学院大学已经把社会学观点传递给了我，反正从那之后我就迷上了它。由此，一个最初的错误让我开始了一个为之奋斗毕生的职业生涯。

究竟是关于社会学的什么观点呢？它有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呢？

事实上，我的社会学观点成形于我在新学院大学学习的这几年，即从1949年开始直到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为止。这要归功于三位老师：阿尔伯特·所罗门（Albert Salomon），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卡尔·迈尔（Carl Mayer）。三位老师都是欧洲难民学者的核心骨干。但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学识领悟却是各不相同。在此，向他们三位表示感谢！

在论到巴尔扎克时，我已经描绘了所罗门的课是如何影响到我的。为了明白一个社会的内在运作而不懈努力，为了了解每个个体的动机（不管是他们的痛苦还是罪恶）而有的无尽好奇，这样的异象使我着迷于社会学。但我从所罗门身上所学到的并不止这些。他主要教导两个课题：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学的根源和涂尔干（Durkheim）的法国社会学流派。所罗门知道社会学是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产儿。为了明白人类世界而需要将理性的运动发挥到极致，因此，社会学本质上就有一种批判精神。我依然相信所罗门对他所称之为社会学的“史前史”（prehistory）的解释是正确的。它绝对是对社会学概念的最好解释。至于社会学这个词本身，是由法国的一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发明的。

所罗门对埃米尔·涂尔干以及他所创立的社会学流派的解释也

相当重要。在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毋庸置疑，涂尔干是启蒙运动的产儿。这可以取证于他的政治活动和他对社会学中社会角色的理解。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绝对是加入了共产党一派。1905 年宪法颁布政教分离原则，紧接着，这一党派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涂尔干在委员会中担任创作共产党要理问答一职，以使用此来取代天主教在公立学校的教导。所罗门在课堂上让大家看了由该机构出版的书籍，名为：《社会学和道德研究课程》（*Course of Study in Sociology and Morality*）。涂尔干的主要观念是“团结”（solidarity）。所罗门认为：当人们读到涂尔干作品中的主要思想时，他们会听到有人在低声喊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项原则：“自由、平等、博爱！”

这种场面可谓是雅各宾党等激进人士对社会学的理解，而且我早就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冷静的、理智性的教导颇有印象，所以我对涂尔干的这种观念并不感冒。但他的其他理论却一直持续地影响着我的想法：应当客观地看待人们难以忍受的现实社会情况（涂尔干：“要把社会事实当成事情”）；为了生存，社会需要一个能够支配一切的道德共识：涂尔干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现代化发展是制度秩序的一种变化，涂尔干解释为：是从“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转变成“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过程，如今它建立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教成为社会神圣性的象征标志；因社会关系的持续贫瘠而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环境，即“社会反常状态”（anomie）。之后涂尔干的追随者，特别是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把对社会的这种理解延伸发展成“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而马赛尔·格拉内（Marcel Granet）和吕西安·利维·布鲁尔（Lucien Levy-Bruhl）称之为“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或“心态”

(mentalité)。我理解这是一种激进的客观主义社会观，这与韦伯以社会行动者主观意识为基础的社会观有着很大张力。很久以后，在我和托马斯·乐格曼合写的书中，我们构思了一种思路把这两种观点融合在了一起。

所罗门是一位杰出的、激情澎湃的讲师。他的性格也很古怪，脾气暴躁。他忍受不了被别人愚弄。如果学生对他的评价让他感觉自己很愚蠢时，他会用讽刺的言语杀死学生。确实有一小群忠实的追随者聚集在他周围。尽管我非常欣赏他所教导的东西，但我并不属于其中一员。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后期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受益于阿尔弗雷德·舒茨。他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点奇怪的是，我对他的印象没有阿尔伯特·所罗门和卡尔·迈尔那么深。我对他的课很感兴趣，又因为都来自于维也纳，我对他又多了一份亲切感（那两个老师是德国人）。舒茨的哲学构架是广义的现象逻辑学。然而，我对此没有什么兴趣。最开始我对社会学含义的重要性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我研究生毕业十年之后，当我和托马斯·乐格曼合写《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时才有点理解。相比之下，乐格曼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探究现象学。他是一个舒茨迷，能够清楚地表述舒茨的思想，在哲学方面比我更有才气。

不管是做学生时从舒茨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是他去世后了解到的他的思想（我阅读了一些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作品，和乐格曼也有一些交谈），让我来解释这些内容多少都有点困难。舒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论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社会学。有点讽刺的是，第二个方面仅仅是舒茨课堂里的一小部分。关于这个主题，我